

名家对谈

作家凭什么让人阅读

韩少功 南翔

我还是一直希望文学贴近现场，贴近灵魂，成为时代的精神回应。这种回应当然有多种方式

南翔: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和大家相会在深圳晚八点·周五书友会,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作家韩少功老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韩老师新出的一本书《人生忽然》。韩少功先生先后任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报告政府》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日夜书》《修改过程》等,长篇随笔《暗示》《革命后记》等,长篇散文《山南水北》,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作品有40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此前,我其实一直在想您为什么这么受读者欢迎?第一,您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辨识度极高的一个作家,您的任何作品把作者名字隐去,读者读一个片段,就知道是您;第二,审美意识非常强,韩老师的语言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有您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第三,创新意识非常突出,每写一本书都不希望跟自己之前的重叠,每一本都不相同;第四,思辨性强,作家一般是用形象思维,但您的逻辑思维能力、思辨力非常突出,尤其最近的散文和随笔,机锋随处可见。

《人生忽然》这本书分三部分,一部分是读大地,您写去欧洲、日本,以及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感受;第二部分是读时代,这部分我读得特别慢,里面有很多当下的元素,丰富而复杂,对于我们表示肯定、欢呼、乐观的现象、见解、收益,您都要问一问,表示犹豫、怀疑甚至质询;最后一部分是读自己,您拿出了很多日记,日记可能最能见出一个人的过往,很可惜这些日记不全,有几年的没有保存下来。正是这些日记让我们可以看出您在写作之初,已经为写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想先请您谈谈自己的一些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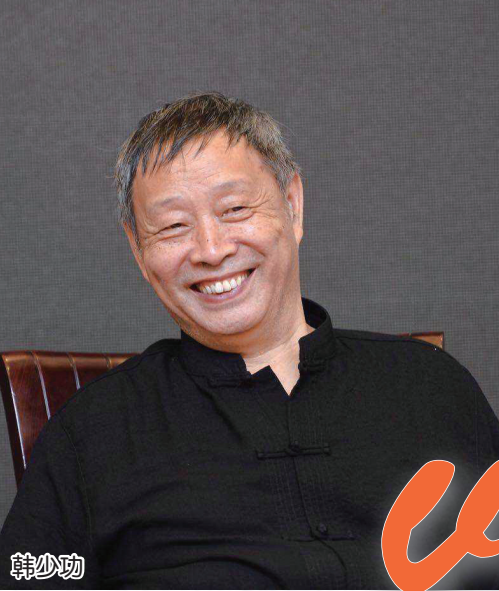
韩少功:谢谢南翔老师,也感谢各位来到这里的读者。在眼下这个时代,读书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需要我们的很多机构,比如政府、大学、企业经常花钱、花人力来动员,举办诸如读书周、读书月之类的活动,这本身很奇怪。以前我们说,书是人的精神食粮,难道有吃饭周、吃饭月的活动吗?可见人们有了“厌食症”,经常只是刷抖音、刷段子,晚上看一眼电视连续剧。这当然也都是文化。问题不在于你是读屏幕还是读纸媒,问题是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现代人其实有很多难题和焦虑,房价问题,孩子问题,国际问题,如此等等。但这些问题怎样找到解决的办法?读书能帮上忙吗?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文学特别让人向往,处于高光位置。中国作协在北京开会,来了很多外面的人,一打听都是剧协、音协、美协的,好多人专门跑来听会,因为文学富有影响力感召力,充满精神的能量。但40年过去,文学已今非昔比,有时候出版社给我寄一箱箱的书,挑来挑去,能挑出一两本有价值的,绝大部分是泡沫,又矫情又空洞,读了十几页还是脑子空空。在互联网上,“文青”“文艺腔”甚至“中文系的”,都成了负面词语,指那些不靠谱、颠三倒四的人。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这让我也万分羞愧。我们的文学干什么去了?

可能我的想法不合时宜,但我还是一直希望文学贴近现场,贴近灵魂,成为时代的精神回应。这种回应当然有多种方式,比方我写过不少小说,以后还会写。现代人眼下不是信息短缺,而是信息过剩,是信息量太大、太乱、太杂,需要清理、筛选、组织、消化的能力。那么,做这种事的时候,散文随笔可能就更方便,更有效率。当然,我不愿做一般的学术写作,比如遇到引文,我会尽量简短,不用深奥的理论去麻烦读者。但是我会特别关切很多理念的现场语境,比如这话是谁说的?是针对什么说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样,我不能不用尽量感性的方式去还原历史的现场与细节,于是写作又回到文学性了,文体就不伦不类“三不四”了。

南翔:我记得七八年前请您做一次讲座,约了很长时间才实现,因为您说想把更多时间留给自己行定、思考、写作。《人生忽然》这本书里关于大地的部分写到您走到南美洲,看到地域差别、文化差别、言语差别。南美洲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文化反差?

韩少功:南美洲是一个地理概念,拉丁美洲是一个文化概念,后者比前者的涵盖范围更大。拉丁文化来自欧洲,在美洲形成了欧洲的文化延伸和文化变种,所以故事得先从“拉丁欧洲”开始。这是一个很多教科书缺失的知识点。德国学者韦伯把欧洲一分为二,一个是新教的欧洲,英国、德国、瑞士以及整个北欧等属于这部分,二是



南部的天主教欧洲,即我说的“拉丁欧洲”,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大部分等。在韦伯的眼里,新教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其最初的传统核心是“理性化”,是狂热地爱劳动、爱节俭等。那么南边呢?差不多就是一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浪荡男女,是韦伯最瞧不起的废人和渣渣。后来,欧洲人到了美洲,新教人群大多去了北美,拉丁人群大多去了南美,大体情况是这样,虽然双方各有一些对方血缘或文化的“飞地”,有点犬牙交错。

现在美洲南北差距很大,整个拉丁美洲的产业研发投入总和,只有美国的1/200。当然还有文化的差别,宗教的差别,肤色和人种的差别等。了解这一切,了解这一切后面的各种因缘,对于我们了解资本主义、了解世界是非常重要的补课。否则,很多朋友嘴里只有笼统的“欧洲”“西方”“国外”,只有几枚道德标签到处贴。不要看中国人满世界去旅游和淘货,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还远未结束。物理学家霍金说过:“知识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对知识的幻觉。”

南翔:北欧、南欧、东欧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您把它从文化、宗教背景划分,开发北美洲的是新教徒,新教主要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其他的到了南边,形成经济上的巨大差别。是不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勤奋、克己、节俭,使得他们有一种产出和富裕?包括提倡慈善。中南美洲似乎显得乱糟糟的,墨西哥、巴西的贫民窟让人目瞪口呆,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韩少功:那种贫民窟的汪洋大海,确实让人震惊,当然是政策失败的严重后果,用他们自己人的话来说,“这一届人民不行”,几乎都是些吃喝玩乐散漫放荡的主。发了工资后,第二天能在大醉中醒来按时上班的,已是最好的员工。约会迟到不超过半小时的,已是最好的客户。他们对贫穷恨之入骨,但一旦经济上违约,做生意拉胯,却又振振有词地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做金钱的奴隶?”那里盛产“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肯定也事出有因。他们的浪漫差不多就是散漫,常常靠军政权才获得一点组织化和执行力。但他们的音乐、美术、舞蹈、足球、涂鸦等,都千奇百怪出神入化,美女和帅哥特别多,特别可爱。那么,他们需要发展经济吗?他们又如何能实现经济发展?这些灵魂之问,也是对中国人的考题,既可给我们以启发,也是对我们的警示。

南翔:在座的很多人写过游记,您前面写的几篇游记里融入了很多思考,并非单纯的游记。我们再来比较另外一个国家,您写到一个日本朋友加藤的故事,并由此写了对日本的一些看法和印象。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国家和他的文化?

韩少功:人总是各种各样的,很难有一个典型能用来代表整个民族。在这一篇里,我写的“加藤”不是实名,但故事完全真实。加藤的外祖父是任职伪满洲国的县长,被苏联红军枪毙了,但他全家又一直是“亲华派”,包括翻译《毛泽东选集》。很多日本人的故事,看起来和中国人的故事同样复杂。

一般来说,我觉得亚洲人对亚洲人有时候会苛刻一些,就像乡下人都容易高看城里人,但乡下人之间反而容易相互苛刻,相互看不起。很多日本人曾把中国人看成野蛮民族,觉得侵略和殖民有理;反过来,很多中国人动不动就“小日本”,觉得黄面孔怎么说也是“假洋鬼子”,要比欧美白人低下一等。这就有亚洲人的毛病了,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了。日本有很多天生的弱项,比如在日本九州挖不出什么历史文物,让日本很没面子。日本也没有什么资源,没什么石油、矿产,而且还多发地震。但日本人把工业搞得很强,因此我很好奇,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让他们更早进入工业化快车道,让中、日两国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我觉得相距这么近的两个邻国,相互之间还是知之太少,知之太粗,知之太浅,是说不过去



的。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上中下,少数极右翼政客不应该成为中日双方人民理解和沟通的障碍。我很高兴这篇文章译成日文发表,也很高兴在台湾见到一个日本读者,他说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特别激动。我愿意为中日之间的沟通做一点小小的添砖加瓦。

百多年来的历史实践,使我们有理由对那些基本命题给予进一步的检验、怀疑、反思以及超越。这也许是我们向前人致敬的最好方式。

南翔:韩老师的思考触角比较广,有些地方非常深入,有些地方自己也在犹豫。比如您在海南生活了30多个年头,虽然中间常常回湖南。我们知道海南这块土地有自己的特质,包括文化、历史,乃至革命的资源。红色娘子军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您写文章的时候先会想起自己下放的经历,后来再涉及前往红色娘子军故地的感受,尤其到了琼海的感受。2003年这篇文章在《当代》发表时一些真正的娘子军战士已经年近,有的人的生活现状也不太如意。您在文章里写到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并由此思考了很多历史现实方方面面重多的关联。您的实际感受是怎样的?到目前为止怎么样评价这一代人的牺牲,甚至不止一代人的牺牲?包括您后来在很多散文中涉及到一个主题——革命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怎样思考这种关系?

韩少功:我是1988年迁居海南的,诸多体会之一,是对海南的女性特别敬佩。是不是男人大多出海打鱼、闯南洋了,反正海南的女人特别能吃苦耐劳,脾气很好,去田里干活,下海打鱼,开店做生意,甚至在当年组成红色娘子军,冲锋陷阵扛住“半边天”。当然,她们的故事也有辛酸和沉重,包括有些娘子军战士,后来在某些事件的冲击下蒙受冤屈。

有一年,我在某地挂职锻炼,一个财政局长来汇报税收情况,让我大吃一惊,发现这个县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1/4。我问这里有这么多有钱人吗?对方吞吞吐吐,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对不正当行业的“征税”,不好叫什么名目。而且这种行业还涉及餐饮、旅馆、服装、美容、医药、交通等更多税种,更让人震惊。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一个不断探索、摸石头、包括试错和纠偏的过程。我并不是要“装圣母”,但不能忍受一部分人的“人性解放”建立在对更多人压迫和欺凌的基础上。正是在那里,我对中国道路,包括中国的红色娘子军有了新的认识。革命当然是暴力,是破坏,是狂飙,是把天捅下来,但革命是卑贱者最后权利,是没有任何和平改良可能的时候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确有必要反思历史,但没理由因此而把引起革命的原因,把人世间的公平和公正,当作美好事物敲锣打鼓地迎回来。

南翔:读大地之后是读时代,这一部分的内容更丰富,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这里有三个词,一个叫“实践盲区”,一个叫“实践窄道”,一个叫“实践浮影”。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搞高科技,都想占领高科技的制高点,但是这个投入非常大,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搞得起来,比如说像高能粒子对撞机,动不动几百亿上千亿的投入。另外在经济时代,好多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也可能没有人搞。为什么呢?资本是逐利的。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盲区,需要搞的没有钱投入,不需要搞的因为利润大,所以投入却很多。再者,我们现在的分工非常细,包括学科也是这样,我曾经让中文系学生学学做对联,因为在我看来对联里包含了很多语实的内容,但是学生跟我说我是学现当代文学的,不是学古典文学的,不会写对联。现在文学作

品评奖也是,分门别类划分很细,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散文就是散文,好似两不相干。今天下午我参加一个评选,有一本书是散文作品,但每篇散文前都有一段诗,评委就提出异议了,说无法归类在散文类别下。刚才路上您也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年有个书店把您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放在了工具书一栏。

韩少功:对的,后来有个读者看到给书店写信,说你们那个书摆错了,《马桥词典》是小说。这个书店还挺负责任的,隔了一个月给读者回信说他们认真研究过这本书,认为没有摆错。

南翔:《人生忽然》写到实践浮影。不说现在很多人真正意义上的动手能力越来越弱,就是需要所学的知识互相打通的地方,也是彼此隔膜,到处是“门禁”。我之前碰到一个大学同事,她曾是舞蹈系的系主任,她跟我开玩笑说舞蹈系进教师也强调招博士,招来舞蹈学博士或许可以写论文,但不会跳舞。您特别强调专业打通与实践能力的重要,我们知道您还回到写《马桥词典》的地方自己种菜,那么您怎么看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关联?

韩少功:人类的知识越来越多了,但这通常是指书本知识、间接的知识,而直接知识、实践的知识却相对地越来越少。所谓“巨婴”,“巨”在文凭上,“婴”在实践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脱离实践的那种。不到一百年前,中国的军队就是农民的军队,一个连长或营长还要带一个文书官,负责看公文、看地图。到现在,我们的文盲率降到4%以下,高校毛入学率达到了50%左右。这是挺好的事。但也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读书、读屏来认识世界,那么书本知识是不特别可靠?不一定。举一个小例子:据统计,美国每年的医疗开支的一半,用于病人的生命最后60天,很多高级的仪器、昂贵的药物都花在植物人、准植物人身上。还有一块是花在治疗性无能、谢顶上,但很多非洲的地方病,还有全球几千种罕见病,同样是病,同样人命关天,同样是探知人体奥秘的宝贵人口,但因为不具有商业意义,相关的购买力弱,就总是被医药商们及研发机构弃之而去,病人只能等死。市场和资本的逻辑是,一切都是为了变,不卖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在知识生产看似高歌猛进之下,是不是有隐患、有盲区、有失衡、有严重的扭曲?

由此可知,“科学主义”的神话是大可怀疑的。科学并非无所不知,被市场和资本所制约的主流科学,甚至从未打算有何必答和有疑必究。坦白地说,我这一类文章是想回应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基本命题。比如那时有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还有一个莫小姐,是指民主、科学、道德。但百多年来的历史实践,使我们有理由对那些基本命题给予进一步的检验、怀疑、反思以及超越。这也许是我们向前人致敬的最好方式。

我说得对不对,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作家总得有点感受、知识、思想的干货,否则你凭什么让人家来读?

现场问答

南翔:刚才与在座的读者朋友分享了《人生忽然》的部分内容,分享了读大地、读时代、读自己。大家可以看到韩老师所关注的问题,辨识度高,思辨性强,创新特质很突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听众:韩老师好,我想问一下真实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韩少功:你这个问题很好。其他作家的情况我不知道,至少在我的作品里,人物多多少少都有原型的依托,而且越到后来,我越喜欢利用这些原型,觉得这样的写作既轻松,效果又好,还容易激发自己的情感。我有一本书叫《山南水北》,写湖南汨罗乡村的事,当地的农民也读,而且能猜出七成左右的人物写的是谁。

听众:我前几天跟深圳大学的几位年轻老师聊天,大家聊到了大学排名的话题,您是如何看待大学的排名现象?现在一些老师也抱怨,过于依赖评级剥夺了他们在科研方面研究的时间,我想问一下,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南翔:比如前不久某高校发生的一起恶性事件,原因很多,但是现在高校的非升即走,是不是导火索之一呢?值得思考。比如课题化生存,拿到国家级课题可以少上课,可以晋升职称。我到现在没有了解清楚为何是这样强大的课题化生存和论文文化生存?包括学位的强调,越高越好,前不久深圳一所中学招聘,最后入选的一二十名老师清一色都是北大清华本硕博连续的学历背景。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说,天才就是偏才。一个大作家可能需三项全能,理论,创作,翻译,比如钱锺书、张爱玲创作和外语都好,但沈从文外语就没有多好。现在,在论文、学位这一方面求高划一,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好事。

韩少功:我非常反感大学的分级。国家想集



中资金,培育一些重点大学,尽快培育出一些科研攻关的骨干力量,这可以理解。但划出三六九等,弊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形成知识利益分配的等级化和垄断化。这对受益方有害,造成有些人不劳而获,少劳多获,滋生惰性和腐败;这对被排除在外的学校更有害,造成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不平等,挫伤更多人才。

我们凭常识都可以知道,一个名牌大学中不是所有专业都好,一个好的专业里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好。但眼下事情荒谬到一些用人单位要计较“原始学历”,如果本科学历不够高贵,一切免谈。这种“出身论”有点令人发指了吧?我认识一个长江学者评委会的资深评委,他说:韩先生,我们也知道“滚滚长江都是水”,但我们也有难处啊。我有自己的专业局限,对专业之外的事务没多少发言权,所以投票时只能看材料。有些人的材料就是好看,你要什么他就有什么,项目、C刊、学历、奖项……都有,您怎么办?哪怕评委们都不徇私情,但也没有理由去否定是不是?我说这个故事,是说制度设计很重要,制度不合理的话,好人也办不成好事。很多“内卷”现象都是制度弊端造成的,甚至会逼迫一些“好人”也鸡肠小肚、拉拉扯扯、急功近利,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和文化垃圾,浪费了钱还是小事,耽误一两代人是大事。

听众:我想问一下,《马桥词典》是怎么构思的?这个作品不按传统小说手法创作,用了人类社会学、语言社会学等一些小词典的方式来记述马桥的历史,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处理?

韩少功:第一个原因,是我当知青时,对方言有感受的积累,社会语言学的兴趣有所萌动。第二个原因,是用词条展开的这种形式,方便把小说和散文的因素融合起来,刚好契合了当时我对小说传统僵化样式的怀疑。我翻译的米兰·昆德拉小说里,有一章《误解小词典》,效果似乎不错,是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一试。

(本文据“文学的回望与前瞻”——韩少功新书《人生忽然》分享会实录整理)